

“富”与“贵”是一对孪生姐妹，常常并称，而“富贵浮云”、“富贵逼人”、“富贵荣华”等则是常见于文牍的成语。然而在中古时代门阀士族衰落之际，却出现了这样一个富而不贵的家庭。

一、富裕之家的子弟

1. 家世变迁 富而不贵

李勣，本姓徐氏，名世勣，字懋功，著名历史小说《隋唐演义》中瓦岗寨的军师徐茂公即是以他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入唐后，他因战功卓著而被赐皇族李姓，名李世勣。唐高宗即位后，以其名犯太宗李世民名讳，遂去掉“世”字，单称李勣。两《唐书》中都有《李勣传》。

李勣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生于曹州离狐（山东东明东北）。曹州，即春秋时期曹国之地，汉朝称为济阴郡，北魏改称西兖州，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始称曹州，“取曹国为名也”。^①隋大业三年（607）改为济阴郡。唐武德四年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11《河南道七·曹州》。

(621)复名为曹州。至于离狐县之名称来由，则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汉朝初置县在濮水之南，后因经常被神狐穿穴困扰，不得不移置于濮水之北，故名“离狐”，取远离神狐之意也。王莽篡汉，为求吉利起见，一度改称为瑞狐县。

李勣一家，至少从他五世祖徐弘师开始，就世居曹州离狐。当时正值北魏与南朝对立，曹州地属北朝，但徐弘师却在南齐任直阁舍人。其孙徐懋（李勣曾祖），官至南梁荆州刺史。李勣的祖父有二说：一是唐高宗御撰李勣墓碑所说，名徐康，任北齐伏波将军、谯郡太守，追赠济州刺史。^①二是《新唐书》所说，名徐元起，官至隋濮阳太守；徐康只是李勣的叔父。^②不管二说孰是，李勣的祖父已到北朝做官，已是不争的事实。惟独李勣之父徐盖一生未涉官场，只是在入唐之后因李勣之功才被赐予陵州刺史、舒国公的荣衔。

隋朝末年，李勣随家从曹州离狐徙居滑州卫南（河南滑县东）。卫南与离狐虽分属两州，但直线距离不过五六十里。显然，其迁徙原因不大可能是重大的政治变故，很可能是徐元起（李勣祖父）在濮阳任职太守，在当地打下了良好基础之故。

总的来看，徐家到徐盖、李勣父子时，已呈衰退之势。在山东地区，他们既无法与崔、卢、李、郑那样的门阀士族相比，也不能和“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那样的“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③的大族相

^① 《全唐文》卷15，高宗《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上柱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英贞武公李公碑》。

《新唐书》卷75下《宰相世系五下》。

^③ 《通典》卷3《食货三·乡党》。

比。即使在他们世居的曹州境内，恐怕也不如当地的蔡、丁、江、曹、易五大姓显赫。① 迁到滑州卫南后，属于新来乍到的客籍户，更无多少势力可言。

不过，徐盖、李勣一家还是一个有某种官宦背景的富裕之家。“家多童仆，积粟数千钟”，② 正是他家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然而，在当时门第观念严重、士庶界限分明的社会中，他们家充其量也只能算一个庶族地主，不免被士族目为“寒门”，就连他自己晚年也自称“我山东一田夫尔”，③ 足见其家政治地位不高。

李勣就是在这样一个富而不贵的家庭中出生、长大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样的家庭可以为他提供优厚、舒适的生活环境，但却不能给他迅速步入仕途、提高政治地位的特权。从李勣以后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充分利用了家庭提供的良好经济条件，在不愁吃穿的情况下，刻苦钻研军事韬略，勤学苦练棍棒刀枪，使自己具备文武全才。否则，他就不可能在 17 岁时就那样足智多谋，那样骁勇善战了。

2. 乐善好施 广交朋友

李勣从少年开始，就与他的父亲徐盖一样，“皆疏财好施

《太平寰宇记》卷 13《曹州》称：“济阴郡（曹州）五姓：蔡、丁、江、曹、易。”

② 《旧唐书》卷 67《李勣传》。

③ 《册府元龟》卷 895《总录部·达命》。

拯救贫乏”，^①而且“不问亲疏”。^②究其原因，除了他们“家富，多童仆，积粟常数千钟”^③即有能力施舍之外，还与他们所受影响及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

李勣的老家曹州与邻近的宋州（治今河南商丘），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风俗：

《汉书》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恶衣食，以致蓄藏。《太康地记》云：豫州之分，其人得中和之气，性安舒，其俗阜，其人和。今俗多宽慢。文中的“今俗”，是指北宋时的风俗。可见在此之前，曹州、宋州一带一直是民风纯朴，“其人得中和之气，性安舒，其俗阜，其人和”，而且人们勤于稼穡，不讲吃穿，注意节约储存。李勣生在此地，长在此地，不可能不受到当地良好民风的熏陶。也可以说，是家乡的纯朴民风，滋润了李勣，培育了李勣，使他具备了以后显露出来的那么多的良好品格。“疏财好施，拯救贫乏”，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

另外，李勣乐善好施，也与他一家所处的社会地位不无关系。如前所述，徐家传到徐盖、李勣父子时，已退出政坛，成为一个富而不贵的普通地主了。在曹州界内，人多势众的是蔡、丁、江、曹、易五大姓，根本轮不上徐家。为了提高徐家的声望，并跻身到社会上层，他们采取乐善好施的方式，以赢得口碑，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策略。迁到滑州（治今河南滑

① 《册府元龟》卷 812 《总录部·好施》。

② 《旧唐书》卷 67 《李勣传》。

《新唐书》卷 93 《李勣传》。

④ 《太平寰宇记》卷 12 《宋州》。

县)后,当地的望族是费、成公、上官三大姓,①更轮不到他们徐家。为了在新居地区站住脚,并发展壮大,他们更需要争取人心,以获得社会各界的赞誉。这大概是徐盖、李勣父子那么乐善好施、以致“不问亲疏”的重要原因吧。

再有,李勣一家是在“隋末”东迁至滑州卫南的,当时的隋朝正在隋炀帝的暴虐统治之下。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究竟是哪一年迁徙的,但李勣生于开皇十四年(594),17岁时从滑州卫南追随翟让起义,②说明大业七年(611),即他17岁的那年,已在那里定居多时了。那么他们东迁的时间肯定在此之前,或大业六年,或大业五年,不得而知。但不可能过早,否则就不能称作“隋末”了。

隋炀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皇帝,称帝不久,就滥用人力、物力,大兴土木工程。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他即位仅4个月,就调发丁男数十万,在“自龙门(山西河津县西)东接长平(山西晋城东北)、汲郡(治今河南滑县东)抵临清关(今河南新乡市东),渡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达于上洛(今陕西商县)”③的1000余公里长的弧线上掘堑,设置关防。大业元年(605)三月又诏令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丁200万人,历时10月修成,当时“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河南荥阳汜水

《太平寰宇记》卷9《河南道九·曹州》“姓氏”条云:“白马郡滑州)三姓:费、成公、上官。”

《旧唐书》卷67《李勣传》。

《隋书》卷3《炀帝纪上》。

镇)北至河阳(河南孟县南)相望于道”。^①同时调发河南、淮北人民百余万开凿通济渠,连通黄河和淮南。又调发淮河民众10余万人修建邗沟(山阳渎),连通淮河和长江。自长安至江都(江苏扬州),兴建离宫40余所。大业三年(607),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开太行山,修筑直达并州(山西太原)的驰道。又调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东至紫河(山西浑河),二旬而罢,死者十五六”。^②大业四年(608)正月,诏令调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北京西南),“丁男不供,始役妇人”。^③七月,再次调发丁男20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④至于其他的小型工程,则不计其数。如此多的大型工程一个接着一个,民众的负担之重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方面,隋炀帝为了炫耀他的豪华和权势,还不断地率领后宫妃嫔、文武官员到处巡游。其规模务求宏大,排场务求阔气,饰物务求精美,消费务求铺张。如大业元年(605)秋天从东都南游江都,其场面如下:

上行幸江都……御龙舟。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

① 《资治通鉴》卷180,大业元年三月条。

② 《北史》卷12《隋本纪》。

《资治通鉴》卷181,大业四年正月条。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⑤ 《资治通鉴》卷180,大业元年八月条。

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鳧、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楯、黄篋等数千艘，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万余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余人，谓之殿脚，皆以锦彩为袍。又有平乘、青龙、鱣鼉、艚、舳、八櫂、艇舸等数千艘，并十二卫兵乘之，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引，不给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舆，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

如此的讲排场、摆阔气，如此的奢侈浪费，堪称空前绝后。次年二月，为了向更多民众显示权威，隋炀帝改由陆路返回东都。于是便诏令大造车舆辇辂，“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帛钜亿计”。^①为了装饰车仗，竟下令天下州县贡献骨角齿牙，皮革毛羽。时“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不得到处设网捕捉水陆禽兽。如果不能完成限额，就只得向豪富蓄积之家高价购买，以致一只雉鸡尾竟值十匹绢之多。^②待一切置办齐全后，炀帝一行于三月庚午日（公历4月28日）从江都出发，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至四月庚戌日（公历6月7日）方到达东都，整整走了40天。其间沿途州县的迎送接待、献食献物，自然又加重了老百姓的苦难。

大业三年（607）四月，隋炀帝又车驾北巡，从长安出发经赤岸泽（陕西大荔南）、雁门（治今山西代县）、马邑（治今

① 《资治通鉴》卷180，大业二年二月条。

② 《隋书》卷24《食货志》。

山西朔县)到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南),在那里以极其隆重的仪式接见突厥启民可汗及奚、霫、室韦等部酋长。尔后由榆林历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沿金河(今大黑河)逆流而上,向边塞各族显示武力。再入楼烦关(今山西宁武西北)至太原,上太行,下济源,直至九月方到东都。这次出巡历时半年之久。一路也是浩浩荡荡,“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①还制造了可以坐数千人的大帐,可以容纳数百卫士的观风行殿和周二千步的行城,使胡人惊以为神。

大业四年(608)三月,隋炀帝又车驾幸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南),巡游长城。五年(609)三月,又西巡河右,渡黄河,至西平(治今青海乐都),陈兵讲武,发动了对吐谷浑的战争。最后到达张掖,接见了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27国的使臣,还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以至“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②当年九月才返回长安。这次西游,又经历了半年时间,对沿途各地的骚扰,自不会少。

与此同时,山东、河南一带的自然灾害频仍。大业三年(607),河南发生大水灾,“漂没三十余郡”。四年(608),燕、代等缘边诸郡发生旱灾。五年(609),燕、代,齐、鲁诸郡发生饥荒。^③七年(611),山东,河南再次发生大水灾,“漂没

① 《资治通鉴》卷180,大业三年八月条。

② 《资治通鉴》卷181,大业五年六月条。

③ 《隋书》卷22《五行志上》。

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① 当时隋朝在河南地区总共置有 28 郡，^② 称“漂没三十余郡”，当是取其约数，意指河南全境受淹。李勣的原籍曹州（济阴郡）和客籍滑州（东郡）自然也在其中。

也就是说，在李勣一家从曹州离狐迁居滑州卫南前后，即大业五六年前后，当地及其邻近地区的天灾人祸特别严重。所谓天灾，就是从大业三年到大业七年之间连续发生的水旱灾害，造成饥荒和“民相卖为奴婢”的悲惨局面。所谓人祸，是指隋炀帝屡兴大型工程、四处巡游夸示而给当地人民带来的苦难。因为曹州、滑州均位距东都洛阳不远，且在通济渠与永济渠交汇处东侧，自然就成为掘堑设关、营建东都、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的劳力供应地，也是隋炀帝南游江都的物质补给地之一。所以这里的民众负担特别重，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也就特别尖锐。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当地一个富而不贵的普通地主家庭来说，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追随隋炀帝，充当其镇压和奴役人民的帮凶；二是同情民众，伺机而动。天资聪颖的李勣及其父亲徐盖采取了后一种选择。乐善好施，不分贵贱，广交朋友，正是他们这一选择的表现形式。

后来的历史证明，李勣一家的这种选择给他们带来了两大好处：一是在贫民中树立了威信，使他们家免遭农民起义的冲击；二是广交了很多朋友，使他们能在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

^① 《北史》卷 12 《隋本纪》。

^② 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中国地图学社出版，1975 年。

大展雄才，成为日后唐朝的功臣和达官。这大概也是李勣乐善好施、不问贵贱的重要原因。李勣在 17 岁时就在翟让义军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在降唐之后仍然为窦建德义军所器重，不伤害他的父亲和家人，说明他们平时拯济贫乏的做法很得人心，在义军中有很多朋友。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隋炀帝滥施暴政 将人民推向水深火热之中 激起了天怨人怒。诛灭暴隋，解民倒悬，就历史地落在一批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肩上。

二、反隋起义的英雄

1. 追随翟让 公开反隋

隋炀帝的暴政激起了天怨人怒，不仅处于水深火热的贫苦农民反抗他，连稍有资财的一般地主，甚至连一些位高权大的官僚贵族也反对他。到大业七年（611），隋朝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满的情绪四处蔓延，就像浸泡过汽油的干柴，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起熊熊大火。

不过，就全国而言，受害最甚的还是河南、山东一带。从历史上看，这里是门阀士族长期统治的地区，土地兼并特别严重，地少人多的矛盾十分突出。从现实来看，这里是大业年间各项力役摊派最多的地区，特别是大业七年（611）为侵略高丽而进行的大征调，更将这里的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

隋炀帝欲东征高丽的念头始于大业三年（607）八月。当

时他北巡至榆林，又专程到突厥启民可汗牙帐观瞻，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高丽使者。隋炀帝早就对高丽不来朝拜心怀不满，现在看到他们宁可讨好突厥也不向自己称臣，更是怒火中烧，当即对高丽使者说：“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与启民巡彼土矣。”^①高丽国王闻知后，更不来朝，就进一步刺伤了隋炀帝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自尊心。于是，他便下决心亲自征讨，诏令做好一切战争准备。首先，他强令全国富人购买战马以备征调，以至马价骤涨，匹值十万钱；派使臣检查武器装备，务令精新。^②又诏令山东地区遍置军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大业七年（611）二月，正式下诏讨伐高丽，计划分海、陆两路进攻。

海路进攻的基地选择在东莱（山东掖县）海口。为了赶造战船 300 艘，他派酷吏元弘嗣前往督役。元弘嗣滥施淫威，动辄棍棒皮鞭相加，强迫工匠在水中日夜操作，结果大多“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③

陆路进攻的基地选择在大运河的北端——涿郡。隋炀帝征调了 113 万军队集中到涿郡，其中包括江淮以南水手 1 万人，弩手 3 万人，岭南排镦手 3 万人。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 5 万乘送高阳（河北高阳县），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需，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米至涿郡，又发鹿车夫 60 余万人运米到边镇，累计征用民夫 200 多万人，超过军士一倍以上。昼夜不停、往还在道路上的运夫常有数十万人，很多人因劳累过

《隋书》卷 3 《炀帝纪上》。

② 《资治通鉴》卷 181，大业六年十二月条。

《隋书》卷 74 《元弘嗣传》。

度而死亡，甚至出现“死者相枕，臭秽盈路”的悲惨景象。^①

如此严重的兵役、徭役，不仅逼迫一般农民纷纷破产逃亡，而且也使普通地主难于承受。当年七月，山东、河南又发生大水灾，漂没 30 余郡，终将当地民众推向了绝境。于是，反抗以隋炀帝为首的统治阶级的农民起义就首先在受害最甚的河南山东地区爆发了。

最先举起反隋大旗的是邹平（山东章丘西北）人王薄。他拥众占据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县东北），活动于齐郡（治今山东济南）、济北郡（治今山东东阳西北）之间，自称知事郎，意为可预知万事，以此号召民众；又创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来劝说农民起义反抗，歌词如下：“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稍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歌谣传播开来，“避征役者多往归之”。^④

随后，平原郡（治今山东陵县）“累世仕宦，资产丰厚”的大富豪刘霸道占据“负海带河，地形深阻”的豆子龠（位于今山东商河、惠民二县之间）起义，有众 10 余万，号“阿舅

^① 《资治通鉴》卷 181，大业七年七月条。

《全唐文》卷 915，德宣《隋司徒陈公舍宅造寺碑》云：“大业五年三月，长白山大洞内有狂寇数万”，意为大业五年三月就爆发农民起义了。按长白山乃王薄起义据点，碑文所述当指这次农民起义。但王薄起义于大业七年，疑此处时间有误。

见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要》，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7 页。

《资治通鉴》卷 181，大业七年十二月条。

军”。①漳南（今河北故城东）人孙安祖、窦建德占据“广大数百里，莞蒲阻深”的高鸡泊（位于今河北故城西）起义，兵至万余人。蓆（今山东夏津县）人张金称在家乡起义，聚众数百人。蓆（河北景县）人高士达在清河（今河北清河）起义，聚众千余人。自是起义蜂起，不可胜数。韦城（河南浚县南）人翟让也在瓦岗寨（在今河南滑县南）聚众起义。

翟让原为东郡（治今河南滑县）法曹参军，骁勇善战，颇重义气，在当地有一定威望。在隋炀帝的暴政下，他坐事下狱，论罪当斩。狱吏黄君汉佩服他的为人和骁勇，认为他可以成就大事，以救生民之命，就不顾个人安危，将其私放出狱。③翟让迅即逃到瓦岗寨，招兵买马，发动武装起义。

关于他起义的具体时间，史无明文。《资治通鉴》将其事记在大业十二年，但那是一种追述形式，不能做为开始起义的时间。按李勣 17 岁时即投奔翟让，而他生于开皇十四年（594），由此推出他 17 岁参加翟让起义的时间在大业七年（611）由此又可以推定翟让发动起义的时间最迟不会晚于大业七年（611）。

翟让在瓦岗设寨暴动的消息一传开，许多贫苦民众纷纷归附。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人：一是翟让的同乡好友单雄信，“少骁健 尤能马上用枪”，④聚集了一批少年前往投奔；二是客居卫南的年仅 17 岁的徐世勣（即李勣）。还有很多“善用长

① 《资治通鉴》卷 181，大业七年十二月条。

② 《旧唐书》卷 54 《窦建德传》。

③ 《资治通鉴》卷 183，大业十二年十月条。

④ 《旧唐书》卷 53 《李密附单雄信传》。

枪”的“齐（治今山东济南）、济（治今山东东阿西北）间渔猎之手”。^①因而瓦岗寨初兴之时虽人数不多，但战斗力很强，当地官府根本奈何不得。

当时的农民义军支数很多，比翟让人多势众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李勣不投靠别人，偏偏追随翟让了呢？其原因可能有如下三点：第一，李勣客居卫南，与翟让同属东郡，有同乡之谊；二，翟让为人仗义，素有口碑，且能担任东郡法曹参军，说明亦有一定文化和谋略；三，翟让的大本营——瓦岗，就在东郡界内，距离最近。

李勣入伙后，瓦岗寨形成了三人领导核心：翟让为寨主，单雄信、李勣为左右臂。由于李勣“有武略”，^②即文武双全，故翟让多纳其计。这也是小说《隋唐演义》把他塑造为瓦岗寨军师（文人）的重要原因。

2. 屡建奇策 壮大瓦岗

瓦岗起义之后，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生存和发展。这是因为当时河南、河北、山东一带虽有多股农民起义军活动，但比较分散，彼此之间缺乏联系和协调作战，因而形不成强大的威慑力量。而隋王朝的力量还很强大，可以利用中央集权的有利地位，集中兵力对农民军进行围剿。在这种形势下，瓦岗起义军如何行动，才能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发展和壮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 2，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4 页。

^② 《资治通鉴》卷 183，大业十二年十月条。

大，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李勣经过缜密考虑，向翟让提出如下建议：

今此土地是公及勣乡壤，人多相识，不宜自相侵掠。

且宋、郑两郡，地管御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就彼邀截，足以自相资助。

这一建议包涵三项内容：

第一，本地东郡是翟让、李勣的故乡，人多相识，无论地主、贫民，“不宜自相侵掠”。即不要在本乡本土打家劫舍，获取财物。

第二，邻近的宋（即梁郡，治今河南商丘南）、郑（即荥阳郡，治今河南郑州）两郡的城邑乡村，也不要侵掠。

第三，只拦截行驶在宋、郑两郡界内御河（即通济渠）上的来往船只，夺取其财物，以满足瓦岗寨的需要。

当时隋炀帝正大规模地调运物资，沿运河北上涿郡，以发动对高丽的战争，以后隋炀帝又两次沿运河南游江都，所以运河上来往船只上的物资多是隋朝官府所有。因此，李勣建议的实质是：以隋为敌，夺取官府的财物，而不骚扰当地及邻近地区的居民百姓。

翟让采纳了李勣的计谋，并以之作为战略指导方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于是，瓦岗军便于通济渠沿线连续出击，抢夺来往船只上的货物，连优良御马“华骝、龙厩、细马”等运往江都者，也大多拦截。^②从而使全军供应充足，武器精良，但一点儿也不增加当地人民的负担，与隋朝的横征暴敛形成了鲜

《旧唐书》卷 67 《李勣传》。

②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 2。

明的对照。民众信任这支义军，支持这支义军，归附者越来越多，很快就发展到 1 万多人。

李勣的建议不仅具有上述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还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意义。就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来看，农民义军远弱于隋军。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军如果长期固定在某一地区作战，就很可能被隋军围而歼之。而李勣建议瓦岗军频频离开本土，到宋、郑二郡的通济渠沿线作战，就使得义军时常处于流动作战的状态之中，不易为隋军围歼。再加上瓦岗寨所在的东郡北有黄河为天然屏障，宋、郑二郡内有济水、汴水、睢水、涣水与通济渠交错纵横，使隋军不易集中，而义军灵活机动。因此，瓦岗军能在强大的隋军攻势面前，左跳右窜，屡败而不致大败，最终转败为胜，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大业九年（613）正月，隋炀帝二征高丽，又一次向全国大规模地征调民夫、物资，并“募民为骁果”，^①集中于涿郡。结果激起了人民更大的反抗，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正月，杜彦冰、王润、李德逸等在平原郡（治今山东陵县）起义，有众数万；白瑜娑在灵武郡（治今宁夏灵武西南）起义，号奴军，劫掠牧马，官军不能克。二月，韩进洛聚众数万，在济北（今山东东阿东北）起义。三月，孟海公在济阴（今山东曹县北）起义，众至数万；郭方预在北海（今山东益都）起义，自号卢公，有众 3 万。五月，甄宝车在济北起义，聚众万余。

当年六月，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隋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大分裂，礼部尚书杨玄感于黎阳（今河南浚县）公开起兵反

^①《隋书》卷 4 《炀帝纪下》。